

古籍今读精华第二辑

张林川 主编

伪书四种

吕 望	《太公兵法》
黄石公	《素书》
黄石公	《三略》
吕 望	《六韬》

湖北辞书出版社

A16608 818230

伪书四种

张林川
主编

吕 望	《太公兵法》
黄石公	《素书》
黄石公	《三略》
吕 望	《六韬》

古 籍 今 读 精 华 第 二 辑

湖北辞书出版社

(鄂)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伪书四种/张林川主编。

-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5

ISBN 7-5403-000015

I. 伪…

II. 张…

III. 伪书-注释-中国

IV. I256.2

伪书四种

WEISHU SI ZHONG

主 编: ©张林川

策 划: 蔡夏初

责任编辑: 蔡夏初

封面设计: 肖炜

督 印: 阎长缨

出版发行: 湖北辞书出版社(武汉市东亭路2号 430077)

印 刷: 十堰日报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插 页: 4

印 张: 12.25

版 次: 1998年5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16.80元(简精装)

ISBN7-5403-0271-2/I·54

伪书与治学

(代序)

一

今天已经是一九九八年元月二日了。

去年的九月，我接受湖北辞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约稿，邀集几位青年同仁和学生，共同完成了《太公兵法》、《六韬》、《素书》、《黄石公三略》四书的注译、述论工作。

三个月有余，编辑一再婉转催促写作本书序言。半个月前，因实在抵赖不过，暂时放开手中的其他工作，开始搜集前人及现代学者有关研究“伪书”的资料，边阅读边思考，拟好了一份写作序言的提纲——（一）伪书的产生；（二）伪书的研究；（三）伪书的文献价值。

第一部分准备从“为什么产生伪书”和“古人如何作伪”两个方面论述伪书的产生，力图既介绍古人的作伪方

式，又揭示伪书产生的深层文化因素。

第二部分打算对前人和今人的伪书研究进行概括性总结，主要解决“历代伪书知多少”和“如何辨伪”。

第三部分主要从这样三个方面论述：1. 伪而非伪。如《尉繚子》一书，过去许多学者视其为汉代以后的伪作，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却有《尉繚子》，证明此书系先秦时代的作品。虽然我们不能以此而武断地作出结论，地底下还埋藏着许多前人认为是伪书的非伪作品，但对于尚存有疑点和争议的所谓伪书，今后不能不慎重。盲目崇古固然不可取，但一味疑古也非科学的态度。2. 伪而有价值。主要论述有些书虽然列为伪书，或是作者有假，或是年代有假，但内容并不伪，如《本草》托之于神农，《素问》托之于黄帝之类，并不损害它们在医学方面的价值。3. 伪而真伪。这类书毫无文献价值，内容造假，仅为研究文献的产生提供一个新的文化视角而已。所有托名而陷害人的伪作即属此类。

倘若照此提纲写作，虽然不可能写出有关方面研究的上乘之作，但这种写作也算得上是对“伪书”研究的一种总结，同时，也向编辑交了差。自感心满意足。

由于写作第二部分的的需要，根据自己平素读书的模糊印象，找来了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载于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清代学术概论》）一文阅读，还从自己的书架上取出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8月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梁启超文选》，阅读了其中《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节录）》一文。

读了梁启超的文章，颇受鼓舞。我的认识和思考与梁文有共同之处，能与大学问家获得一致的认识，更加坚定

了我写作这篇文章的信心。

根据我所收集的资料，包括以上所举梁文，并从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与当代人的两种截然不同行为的比较中，即春秋战国时人著书好托古，而当代几乎找不出一例著书后不署己名而署他名的，相反，文章和著作为署名不当，作者之间往往还发生许多纠葛。从而对有关伪书产生的原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伪书并不是同一文化的产物，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伪书，都因不同的深层文化背景所使然。

春秋战国人著书托古，普遍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衰败，人伦道德的丧亡，以及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无义之战，使人不敢设想未来社会的前景究竟何在？那个社会尚不具备承受巨大社会动荡冲击的思想能力，即便是圣人孔子，也不得不寄托三王圣世和周初政治，竭力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治世的良方，同时也借助经验建立自己的学说。所以，经验主义导致了托古和借重权威，那些没有勇气用自己的名义建构某种学说的人，又想使自己的学说被社会所接受，于是写好著作便托名给已逝的权威。《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大批伪书便是实证。如《力牧》二十二篇，托名力牧，力牧乃黄帝相也；《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托名周初姜望撰，姜望是文王师尚父。自汉以降，伪书产生之因与春秋战国则大不一样，有的在形式上虽然也是托古并借助权威，但动机与以往大大不同。春秋战国的伪书托古借重名人，是以宣传思想学说为目的，毫无一点功利主义，而汉代以后的种种作伪，大多以利己为目的。有在学术上争胜而作伪的，有邀功请赏而作伪的，也有为诬陷他人而作伪的，还有为炫名而作伪，甚或剽窃他人作品的。总而言之，“托名”与“剽窃”形

成鲜明的反差。倘若给“作伪”一个总的评价，先秦时代的作伪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它只能在学术的范畴给予批评，批评它混淆了历史，搞乱了思想。而汉代以后的作伪，还必须在道义和人格上受到谴责。

有了对“伪书”的这些思考，自然不免得意，对《伪书四种》也有个交待。

得意之余，由于工作的习惯，即穷追不舍、究根刨底是我们从事古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者的基本思维和工作方式，我所阅读的毕竟是梁启超有关方面论述的节选本，不看全本依然不想动笔作序。于是，从图书馆借来了中华书局一九五五年出版的梁氏《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

一口气读完了梁氏近十万言的著作，真是痛快！痛快之后则是懊丧。原来我所思考的“伪书”，梁启超先生早就有论述，不仅远比我思考的周全，而且比我所思更为深刻透彻。可以说，有关中国伪书的方方面面，除单个伪书的微观研究之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前人和今人再没有能超过他的。这篇序言我该如何作呢？

于是，我放弃了原有写作序言的计划，便有了这以上和以下的几段文字。同样的观点不断反复，即使不是剽窃他人的一种有意作伪，但在旁人看来，也难免有“伪作”之嫌。而且制造这种伪作，所谓“文字垃圾”是也，无疑是对人类精力和地球资源的一种浪费。

二

上述是我计划写作本书序言的经过，也是在未全面阅读梁启超有关方面文章时，对伪书的一点初浅认识。事实上，从中也引出了一个新问题——治学的态度。我不敢

说自己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因为达到十分严谨的程度，必定是在学术造诣上有一定档次的人。但我至少做到了在思考什么叫“伪书”以及古人如何“作伪”时，远远地避开了又一次“作伪”的嫌疑，哪怕只是“作伪”的一次小小行动，在学术的海洋里根本掀不起一丁点的浪花，我还是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坚决地回避了。

然而，使我感到特别诧异的是，在我翻检今人的有关研究成果时，竟然发现有与梁氏毫无二样的文章！但愿这是未见梁文而与梁同一思维的一种偶合。孤陋寡闻，不知梁有“伪书”的论断，并不算无知，倘若有意剽窃，那就不是无知，而是埋没了研究学问的良知。

现实又引起了我对古人作伪原因的深思，特别是汉代以后的作伪。

梁启超在探讨古人作伪的动机时讲述过，汉武帝、唐太宗稽古右文，悬赏征集古书，有许多无聊的文人则乘机干起投机的事业。所以书每失一回，每征集一回，伪书则愈多一些。“因为造一部伪书，既可卖钱，又可作官，利之所在，人争趋之”。自秦火以后，百篇《尚书》所存不足三分之一。汉成帝酷好这部书，四处求访想得到足本。一位名叫张霸的，也算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为迎合皇帝所好，造出一百零二篇《尚书》，比足本还多出两篇。汉成帝初获此书，不胜欢喜，立刻赐给张霸一个博士官职，这个官职的地位比现在北京名牌大学的教授还要吃香，因为那时的知识分子的比例比现在少，大学也少。后来发现此书是张霸伪造，张氏险些掉了脑袋。古时犯了欺君之罪不砍头是少有的事。隋文帝时，大学者刘炫因假造连山、归藏两部《易》书，就被砍了头。如果不是汉成帝惜张霸伪造《尚书》有才，命也早归西天了。这是因为伪造

假书犯了欺君之罪大逆不道而被杀头和革职的，还有许多与皇帝无直接的关系而投机成功的事例。汉景帝时的河间献王不遗余力地搜罗了不少古文经，其中假的很多，很多人也捞到了好处。这些都是作伪邀功请赏的例子。

梁启超还讲述了因学术争胜而作伪的。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道教著作。梁启超说：“现在道藏中，黄帝著作几达百种，老聃、庄周亦各数十种，诸如此类，伪书甚多，其目的在与佛教争胜，或与儒家争胜。”

另外，炫名和掠美也是古人作伪的动机。晋人张湛伪造《列子》，因为当时许多学者注解老、庄书出了名，如王弼、向秀、何晏等。张湛也想出风头，但走人家的老路不行，必须别开生面，所以他伪造了《列子》并注解《列子》，果然如愿以偿，大出风头。所以梁启超评论说“这算是走偏锋以炫名”。按照梁的观点，炫名只是虚荣心在作怪，而邀赏则更卑劣。掠美者，掠人之美为盗窃，这种行径完全走向了春秋战国人作伪的反面，手段恶劣，行为卑鄙，最为学界所不耻。如郭象盗窃向秀的《庄子注》，王鸿绪盗窃万斯同的《明史稿》，是学术史上的最大丑闻。梁启超的书是讲课稿，由他的学生姚名达等人记录整理，论证和举例都十分精彩。

梁书读起来十分精彩，但读完之后，中国文化的这一现象使我产生了沉重感。同时，对于汉代以后作伪趋利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汉代以后，作伪的人主要以功利为目的，无论是托他人之名制造假书，还是剽窃他人著作，与先秦时代写好著作，自己埋名隐姓而署他名有很大的区别。这充分表明，著书建立自己的学说，在文明社会里是逐渐产生影响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先秦诸子，尽管著书立说，有的还聚

徒讲学，在学术事业上轰轰烈烈，但在政治上别人并不怎么看重，除了少数法家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曾有显赫地位之外，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等，都在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那时候，著作、学术在上层统治者心目中并没有多大的分量，他们主要看重权谋、军事。所以多点子、会打仗的人都受到重用。孔子受到冷落，常常发出不得志之感慨，就是证据。圣人当时也莫过如此，何况一般著书立说的人呢。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朝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息武修文，比较重视文教政策。特别从汉武帝开始，大兴举贤良对策、考献征文之风，学术成为朝廷统治下的天下公有事业。思想学术与政治统治的这种紧密结缘，写书的人所写的著作、建立的学说，既是封建统治下的公有财产，同时也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读书做学问的人不恪守学术原则，坚持按学术规律行事，追名逐利，甚至比追名逐利更为严重的完全违背学术良知的所有荒唐行为，都有可能发生。

梁启超在他的书中曾举一典型事例。汉代刘歆，本来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学问家，知识十分渊博。但他为了显名争胜，在整理古代文献时，篡改了许多经典文字。梁氏对他站在经古文立场上与今文派作对很不满意，并说他背叛家学，父亲刘向是今文派，另外还背叛了自家朝廷，做了王莽的国师，结果落得个既不忠又不孝的臭名。我认为不忠不孝无关紧要，在学术上站在哪一派也是他的自由，不必强求。但任意改经以与敌对派争胜，这种手段尤为卑劣。做学问的人，倘若在学术上把握不住原则，做人也是绝对做不好的。人格和学品受一个心灵的驱使，是不会变换脸谱的。西汉末政权动荡不定，民间传一民谣，“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刘歆居然改“歆”为

“秀”，欲应民谣，做着当天子的美梦。作伪作到这份上，人格和学品又有什么两样？人们之所以公认司马迁伟大，他的学品是高尚的，人格也是高尚的，是高尚的统一。才气和学问不等于高尚，有才有德方可贵。

伪作虽不始于汉代，但作伪动机十分不纯却是从汉代始。尽管汉代学术隆盛，出了许多成果，造就了学术史上的许多伟人，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史在许多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史有司马迁，文有汉赋，目录学有刘向，文字学有许慎，还有王充的《论衡》，刘安的《淮南子》等等。但汉代的学风在许多方面是不能恭维的。伪造经古文，伪造先秦诸子作品，制造许多谶纬书，都与“作伪”有关，在我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许多不光彩的篇章。而且余风一直影响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的人也作了不少的伪书。这是应当引起学术史专家高度重视的问题。看了梁任公的书，不仅增长了见识，一边为他的博学和敏锐喝彩，一边感觉心情沉重，直觉得中国学术史还需要猛力地反省。不然，伪作将在现实中变换另一种形式继续生长。

三

书中，梁任公的这几句话使我感触颇深，他在谈到刘炫被隋文帝杀了时说：“一代大学者，因为造假书砍头，太不值得。但须知奖励过分，无异明白教人作假。这也不能单怪刘炫啊！”或许因为作者惜才，所以将作伪的责任同时也指向“奖励过分”，多少觉得刘炫有点屈死。我说梁启超敏锐，其中之一就表现在这儿。家中有藏书，或者发现古书，能献给国家或向征集书的官员提供线索，给予适当的奖赏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是一种互惠原则。但物极

必反，“奖励过分”则免不了产生错误导向，会引导人走向名利的死胡同。制订有关学术事业的政策，千万不能津津乐道于“以利诱之”。倘若过于强调学术事业与人的利益紧密挂钩，其危害与对待学术事业的冷漠态度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诱之以利是可能产生作伪的一个方面，在学术界常常有人犯“急功近利”的毛病，这是作伪的另一个方面。许多学术领域，非有坐冷板凳的功夫不可，有的人往往十年磨一剑还嫌剑不快，有的人一日磨十剑却还嫌太慢，功夫不到家，哪能不出伪劣产品呢。

走治学之路，是学者的一种自觉行为。有些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以利诱之”和“急功近利”都是学术领域里产生伪劣产品的温床。

所以，梁启超的所谓“辨伪的发达”，我称之为“辨伪史”，应当继续下去。古代伪书应当继续辨，现代的伪书伪文也应当辨。古伪书不辨，不能了解真正的历史；现代伪书不辨，贻误后人，而且如果坏了学风，学术研究不能正常发展，表现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则迟迟不能到来。

这一任务，主要应当由从事文献研究工作的人来承担。在文献学专业设“文献批评”的方向，采取“书目提要”、“书评”等方式辨别伪作和淘汰伪作。一则杜绝漫漶，二则当代的事情尽量当代解决，不要给后人留下无穷的麻烦。

以上主要是对不同时期的伪书和作伪原因的议论。下面还想具体谈谈《伪书四种》。

将《太公兵法》、《六韬》、《素书》、《黄石公三略》编为一辑，是因为这四部书都是讲谋略、兵术的书，四部书

都是道道地地的伪书，而且相互之间有扯不断的瓜葛。《太公兵法》和《六韬》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伪书，托名给姜太公的。《素书》和《黄石公三略》是汉代以后的人作伪托名给黄石公的，也有人说是姜太公作的。除此之外，《史记》中记载圯上老人传书给张良，有的说所传乃《太公兵法》，还有的说所传是《素书》或《三略》。这样一来，这四部书在民间早已蒙上许多神秘的色彩。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追寻它的神奇而整理注解它的。相反，有些蒙昧无知的人，多少次梦求从这几部书中获得魔力般的韬略，我们的作法不仅没有圆了他们的美梦，却是对这种美梦的破译。原来这四部书只是我国古人智慧的记录。张良是我国古代杰出智人的一位代表，他协助刘邦夺得了天下，是他顺应了历史潮流，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而已，并没有什么隐秘的绝招。况且刘邦统一天下绝非某人之力，而是刘氏集团综合力量与敌对势力较量的胜利。

我们整理它，主要因为它尚能启发今人的智慧，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古今相通是常理。虽然是伪书，诚如梁任公在他的书中所言，伪书有四种功用：伪书“断不能凭空造出，必须参考无数书籍，假中常有真宝贝，我们可以把他当做类书看待”；“第二种功用是保存古代的神话”；“第三种功用是保存古代的制度”；“还有一种保存古代思想的功用也是伪书所有的”。我们只要记住了一个前提，清楚地了解了伪书的真实作者或写作年代，伪书的四种功用确实是存在的。而《伪书四种》主要是记述古人思想智慧的书籍，诚可谓“假中常有真宝贝”。

张 林 川

记于武昌沙湖西岸湖北大学三鹤旧屋

目 录

伪书与治学(代序)	1
-----------	---

太公兵法

《太公兵法》简论	1
第一篇	7
第二篇	14
第三篇	29
第四篇	36
第五篇	42
第六篇	56
第七篇	69
附:《太公兵法》序	73
答汪仲伊山长书	75
汪氏兵学三书叙	77

素 书

《素书》的基本内容及权谋思想述评	81
原始章第一	91
正道章第二	98

求人之志章第三	102
本德宗道章第四	109
遵义章第五	116
安礼章第六	130
附：黄石公《素书》序	151

三 略

《三略》简评	153
上略	159
中略	180
下略	187

六 韬

《六韬》作者及流传述论	197
文韬	213
武韬	237
龙韬	249
虎韬	277
豹韬	302
犬韬	315
《六韬》逸文	332
附：《六韬》序	376

太公兵法

(旧题) [周] 吕 望 撰
[清] 汪宗沂 辑佚
郭康松 译注

《太公兵法》简论

太公吕望以自己的智慧谋略，助周文王征服崇、密须氏、犬夷等，使周文王成为西方霸主；文王死后，又辅助周武王推翻暴虐成性的商纣王的统治，建立起周朝，因而“后世言兵权奇计者，咸宗太公”。（汪宗沂《太公兵法逸文序》）《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太公》二百七十篇，《隋书·经籍志》有《太公六韬》五卷，旧题为吕望所著，实皆伪托。后人论兵权谋略者，为使人信其言，多依托太公之名，以自神其说。清末人汪宗沂认为“《六韬》文多

不纯，疑梁庾仲容为子钞时，《六韬》已非原本”，而“隋唐《志》所存《六韬》既非复《汉志》之旧”，所以他博览广搜，从古代文献典籍中辑录出他认为真实可信的有关太公兵法谋略的材料，汇为一编，成为《太公兵法》。

汪宗沂，清末安徽歙县人。字仲伊，亦号韬庐居士。曾在山西做过知县，加五品卿衔。后专事著述，研精礼学，洞悉乐吕，著有《逸礼大义论》、《周易学统》、《声谱》、《管乐元音谱》、《诗说》、《孟子释疑》、《黄庭经注》等书。亦悉心谋略兵法之学，撰著辑录的谋略兵法之书有《三湘兵法》、《汪氏兵学三书》、《云气占侯》、《〈旧唐书·李靖传〉考证》、《三家兵法通辑》等书。《太公兵法》即汪氏《三家兵法通辑》中的一部。

汪宗沂辑录《太公兵法》的资料来源，据他所作的《序》是：“曰《说苑》引《太公兵法》，曰《大戴记》引《周书》、曰《皇览》、《意林》引《金匱》、《阴谋》，曰《左》、《史》、《汉》、《通典》、《御览》引《周书》及《周书·武称》，曰周、汉、隋人引《兵书》、《军志》，曰唐人书引《六韬》，曰今本《六韬》之近古者，曰《黄石公记》逸文”，他将这些资料“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合之为《太公兵法》”。汪氏辑编《太公兵法》的根本出发点是认为太公吕望确有兵法之书传于后世并被他人引用，他并不否认传世的《六韬》之中包含有一部分真实可信的太公兵法的内容，只是后人依托“原文”进行了大量的造伪，使其真伪参杂，而自己所辑，乃太公兵法真经。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太公吕望没有关于论兵的著作，但像汪宗沂将古文献中所谓的“太公曰”、《周书》、《金匱》、《阴谋》、《黄石公记》、《兵书》、《军志》的内容辑为一编，命名为《太公兵法》，自信其是，并让人们相信他之所辑就是太公